



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吴庆梅 肖希明

摘要 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历经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与他早期所处的社会、教育背景以及从事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分不开。这一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涵义宽泛”的图书馆教育观、具有家国情怀的图书馆教育功能观、德才兼备的人才观、教书育人的师德观、知行合一的教学观、富有前瞻性的学科建设观。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中关于“社会教育”的思想、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对当今图书馆学教育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刘国钧 图书馆学 教育思想 教育史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2.012

1 引言

刘国钧(1899—1980),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及中国书籍史、思想史研究学者。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生涯始于1925年东南大学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合办的图书馆学暑期学校^[1]。作为图书馆学教育家,他的前半生服务于金陵大学,历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部主任、代馆长、馆长,校文理科长、文学院院长及校秘书长,以及金陵大学哲学、图书馆学系教授,兼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工作时间近二十载。1951年,刘国钧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历任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代系主任、主任,先后兼任国家科委图书小组成员、北京图书馆顾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顾问及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2]。1980年因病去世。

中国图书馆界对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领域的建树研究颇多,但对他作为图书馆学教育家的专门研究则较少。丁伟国利用文献计量方法统计分析2013年前以刘国钧为主题的论文,发现对其生平及学术思想、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分类编目思想的研究最多,超过论文总数的八成,其他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3]。对刘国钧在图书馆学教育方面的贡献,2013年前,李

明华^[4]、朱天俊^[5]、金恩辉(又名金恩晖)^[6]等学者在研究中有所涉及。2019年,在刘国钧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吴慰慈^[7]、曹阳^[8]、徐雁^[9]等学者通过纪念文章论述了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的贡献和成就,其中尤以徐雁的论述最为系统。但截至目前,对刘国钧先生数十年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形成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研究却较为少见。本文将系统梳理刘国钧1925年留学归国后的图书馆学教育活动,并通过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和著述深入分析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探讨其当代价值,以期能够对当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改革有所借鉴。

2 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来源

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与他早期所处的社会、教育背景以及从事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分不开的。

2.1 社会背景

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潮流中,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教育救国”一直是爱国知识分子怀揣的理想。刘国钧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与迅猛发展的时期。1920年,尚在金陵大学求学的刘国钧在南京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由王光祈、李大钊等创设的少年中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及其文化影响研究”(编号:17ZDA295)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肖希明,ORCID:0000-0002-0715-6038,邮箱:xxmwhu2011@163.com。



国学会。年轻的刘国钧向往以学术研究救国,在少年中国学会内,他对社会改造问题的复杂性和自身事业的选择有了清醒的认识^[8],决定以图书馆事业为终身职业。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刘国钧认识到学术团体作为“教育救国”的主力军,“盼望有大多数学术团体出来作公,同为人类的文化谋发展的运动”^[10],这成为刘国钧以后从事图书馆事业的逻辑起点。

1919年“五四运动”后,杜威、罗素等世界一流哲学家来华演讲,杜威的“实用主义”和“教育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唯一工具’”等思想^[11],罗素的“分析方法”和坚持科学的大无畏精神^[12],对刘国钧影响颇深。学界大量引入的西方先进思想,引发了刘国钧先生对哲学、人生以及教育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他通过对哲学和图书馆的学习,体会到“哲学……玄之又玄”^[13]，“知识之作用……在其对于现实世界之影响也”^[14]，要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图书馆作为“实学”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因此，西方思想和杜威等人的演讲与刘国钧献身于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密切相关。

2.2 教育背景

教育经历对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和社会认知的形成至关重要。1912—1916年,刘国钧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该校教学质量颇高。中学三年级时,刘国钧就在该校学生刊物《学生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5篇作文习作,中英文行文流畅,条理清晰,为其后入读金陵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7—1921年,刘国钧先生就读于金陵大学,教会大学早期文理并举的课程体系和刘国钧自身优秀的成绩,造就了他文理交融、中西汇通的知识结构^[15]。1922年,刘国钧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学习,加修图书馆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正是由于留学期间既深入研究哲学又兼顾图书馆学,刘国钧才坚定地由哲学领域转向图书馆学领域^[16]。

名师出高徒,求学路上的指导老师也是影响青年刘国钧图书馆学思想认识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中,洪有丰先生是他事业的引路人。刘国钧在《敬悼洪范五先生》一文中回忆到,“我早在1917年初就认识了洪先生。由于他的指引,我走上了图书馆学这条路。”^[17]国外学者有包文、克乃文和韩穆敦,1922年他们推荐在金陵大学图书馆供职的刘国钧赴美学习哲学,并加修图书馆学课程。克乃文在推荐其留

美的信函中特别指出,刘国钧具有“在中国从事图书馆服务的崇高理想。”^[18]

刘国钧先生在中学、大学以及国外留学的学习经历、受教内容,业师的传道授业等,都对其后来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3 图书馆实践活动

早在大学求学期间,刘国钧为缓解经济困境,就利用课余和假日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兼职,从而使他对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有了较多的切身体会,并逐步形成了图书馆是重要的教育机构的认识。这也是以“教育救国”为职志的刘国钧后来义无反顾地选择图书馆作为矢志报国的终身职业的思想根源之一。

1925年刘国钧先生留学回国后,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任文学院教授。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刘国钧先后担任出席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的使者、执行部副部长、出版委员会主任、图书教育委员会的委员^[19]。1926年初,协会会刊《图书馆学季刊》问世,刘国钧为编辑主任。1929—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继续负责编辑《图书馆学季刊》,并在北平师范大学兼课^[20]。1930年,刘国钧先生重回金陵大学,历任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及教授。1943年2月,刘国钧任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委会主任,1944年正式开馆后,任西北图书馆馆长,兼任西北师范学院哲学系教授^[21]。从中华图书馆协会到国立西北图书馆的成立,从金陵大学到北平师范大学再到北京大学,可以看出,刘国钧先生既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实干家,又是一位图书馆学教育家。作为图书馆事业实干家,刘国钧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和办馆思想与经验,对于后来他在实际教学中形成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体现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3 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内容体系

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历经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

3.1 涵义宽泛的“图书馆教育”观

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教育都是“舶来品”。据学者考证,我国“图书馆教育”一词最早见于1911年谢荫昌翻译的日本人户野周二郎的著作《图书馆教育》^[22]。该书将“图书馆教育”作为与“学校教育”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认为“图书馆



教育”就是利用图书馆对普通民众进行的教育,是辅助学校教育的一种教育形式。当时这种阐释是合理的。在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文华图专)创办之前,作为一门学科的图书馆学还没有真正形成,自然还谈不上“图书馆学教育”。到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界的一批学者开始对“图书馆教育”作了双重含义的解释。如1925年杜定友在《图书馆通论》一书中论及“图书馆教育”时,就指出“盖图书馆教育之方法,其目的有二,一以养成图书馆管理专门人才,一以养成一般读者,使直接受图书馆之利益。”^[23]刘国钧也是“图书馆教育”双重含义的倡导者。1925年,刘国钧在《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一文中谈及“图书馆教育”时指出,“公共图书馆者直接之教育机关,而与学校相辅相成者也”,“学校教育常易趋于专门,而图书馆教育则为常识之源泉……图书馆教育,苟善用之,其影响于社会于人生者,且甚于学校。”^[24]显然,刘国钧在这里所认为的“图书馆教育”是指面向大众的社会教育。而1934年刘国钧在《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谈及图书馆从业人员培养时,指出“图书馆人员的研究包括图书馆人员养成的办法(如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学课程编制等)”^①。这里刘国钧认为的“图书馆教育”应该是指培养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

刘国钧不仅是双重含义“图书馆教育”的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者。作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工作者,刘国钧于1927年在金陵大学设立图书馆学系,担任教授,长达十多年,“……刘国钧先生对于‘分类’,李小缘先生对于‘编目’,万国鼎先生对于‘检字法’,均系国内一时威权学者,担任该系教授,实为难得。”^[25]他不仅致力于学校教育,还十分重视图书馆学业余教育,认为仅靠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图书馆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学校教育必须与业余教育相结合。基于这种理念,早在1923—1926年他就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图书馆协会、江苏省教育会等机构连续开办的暑期图书馆学校授课。同时还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各地,在包括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图书馆讲习班、苏州东吴大学暑期学校、成都图书馆员讲习班等处为图书馆员授课。

作为“社会教育论”的倡导者,刘国钧认为应该向平民普及图书馆教育。“其始,仅学者与教士,继乃及于教师与学生,后又扩及儿童,今且注意于各种人物:若工人、商人、美术家等,皆图书馆所企图服役

者也。”^[26]20世纪30年代他将这一思想进一步诠释为:“现代图书馆对于阅览人员是无限制的。它是要将知识传播给任何人的;它不愿知识为少数人独占;它极力想法和民众接近。”^[27]刘国钧认为图书馆教育的对象不仅仅是成人,也包括儿童。“故其目的在使凡有阅读之能力者,不问其年龄、阶级与性别之如何,皆得有其适当之读物。苟年龄太幼不能诵读者,则为之备置图画。”^[28]他认为图书馆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1925年,在中华图书馆协会联合中国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开办的图书馆暑期学校中,刘国钧提议开办“儿童图书馆”课程并亲自执教。在暑期学校课程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儿童图书馆”课程为每周2课时,占0.5学分,由李小缘和刘国钧担任教授^[18]。他的论著《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书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可爱的中国书》《中国书的故事》等传达出儿童图书馆教育的理念^[29]。

民国年间,民智初开,虽然新式学校教育已有较快发展,但能接受学校教育的社会底层民众毕竟少而又少,因此社会教育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而作为社会教育一部分的图书馆教育,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特别是1937年前,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图书馆专业人才短缺,因此以各种方式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也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刘国钧及那一代图书馆人,在“两条战线”上开展图书馆教育,实乃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之举。

3.2 具有家国情怀的图书馆教育功能观

对图书馆和图书馆教育事业重要性的认识,是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基础。1923年,他在《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一文指出“图书馆今日不惟研究学术所必须,且为社会教育之利器”^[22],甚至“图书馆在教育上的价值,有时竟过于学校”^[7]。图书馆的这种社会教育功能,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更具特殊意义。20世纪上半期,战乱频仍,国无宁日,刘国钧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为武器,投入爱国救亡运动。他认为图书馆的文化教育功能对国家至关重要。1938年他发表《图书馆与民众动员》,称图书馆“在平时是增进人们治事能力的机关;在战时,更是坚强人们意识的工具……图书馆可以控制或指挥人民的思想 and 行动,这在战争时期似乎更为显著。

①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M].上海:中华书局,1934:13.



所以在目前战局紧张,需要民众全体动员的时期,图书馆应当尽他的力量,以协助者全体动员的实现。”他鼓励图书馆将“编辑书目”“推广图书馆”等图书馆自身工作内容方法与抗战宣传工作相结合以发挥自己的作用^[30]。显然,刘国钧在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中倾注了浓烈的家国情怀。

图书馆事业要持续发挥爱国救亡的文化教育功能,就有赖于大批的图书馆专业人才。1942年,国民政府实施文化教育战略大转移和西部开发,聘任刘国钧担任筹委会主任,成立国立西北图书馆。办馆期间,刘国钧以图书馆员教育为先。他提出:第一步先采用举办馆员座谈会及讲习所的形式,来交流专门知识,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及能力;第二步可举办三个月至一年的短训班以弥补当时人才缺乏;第三步以此为基础筹备图书馆专科学校,培养图书馆方面的专门人才^[31]。他建议筹备图书馆专科学校,亲自主持举办馆员座谈会、讲习所,数次应邀为西北训练团讲授图书馆学有关课程,推广使用《中国图书分类法》《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等适合中国国情的分类编目标准^[22]。

家国情怀还体现在刘国钧的晚年,在逆境中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执着的关注和坚守。“文革”期间,刘国钧从北京大学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劳动。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不忘一个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者的使命,依然关注国外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进展,坚持阅读和翻译国外机读目录编制等方面的资料,自译自编《国外图书馆动态》手稿,并于1975年发表了《“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一文。直到1980年他去世的当年,还发表了《论西方图书分类法当前发展的趋势》一文。可以说刘国钧是满怀爱国之情,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3.3 德才兼备的人才观

作为图书馆学教育家,刘国钧的人才培养理念是德才兼备。他要求的“德”,是图书馆人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20世纪30年代,他在《图书馆馆员应有之素养》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员的职业精神和责任即服务,“每一馆员之来此,应有人群服务之想……盖有服务精神,始能吃苦,能做事,能为阅者多方设法而无怨”。他谆谆教诲图书馆员“对阅者应持和蔼态度”,认为“一馆名誉之优劣,皆系于此”。在

谈及馆员素质时,他总结为“馆员应有之素养,尤以和蔼之态度及丰富之常识二者,最须注意。前者所以吸引阅者,后者所以指示阅者也。”^[32]20世纪60年代,刘国钧在《也谈谈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一文中再次强调,图书馆工作者最根本的职业精神就是“乐于服务的精神和善于服务的技能。”他指出“图书馆工作,不管其内容是什么,都是服务的工作——为读者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33]。在平时的教学中,刘国钧经常以自己为例,谆谆善诱,教育同学们热爱图书馆专业和图书馆事业。他曾以自己的学习经历教育学生金恩晖,说自己“早年被授予美国哲学博士学位,对中国道教和老子哲学有过系统研究,由于感到图书馆学更需要有人开拓,从此就将主要力量致力于现在的专业了”。^[34]金恩晖循此教诲,一生致力于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研究,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培养或指导过的学生不胜枚举,他们没有辜负先生不倦教诲和殷切希望,在海内外图书情报领域努力工作,很多成长为图书情报界重要的学科带头人或业务骨干。

刘国钧要求的“才”,就是我们现在致力于培养的复合型人才。他认为图书馆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应习知管理方法”,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包括“乐于服务的精神和善于服务的技能”,“精确细致处理事务的能力”,“能够运用祖国语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总结工作的能力”。除此以外还应具备“图书馆学”“本国历史”“本国文学史”“使用基本工具书,参考书”等基本知识。对于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人,他认为“在上述基本功之外,还要加上:(1)一门至两门外国语;(2)现代科学技术概论;(3)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基本知识;(4)目录学和一门专门科学知识。”^[33]

刘国钧将这些人才培养理念贯穿到他的教育管理实践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任教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开设了“高级图书分类法”“图书馆目录”“中国书史”“西方图书分类法介绍”等课程,并编写了《图书馆目录》《中国书史简编》《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等教材。除了支持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人才培养之外,他还根据函授教学需要,为函授生开设“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课程,并编写《图书馆事业史大纲》《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参考资料》,供函授生学习和阅读^[5]。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教育情况,针对图书馆在职人员编写了《图书馆员基本业务知识讲话》《关于图书馆目录的几个



问题》《图书馆编目基本知识讲授提纲》等文章,深受馆员好评。他还积极支持图书馆界举办的各类业余图书馆员学习班和培训班,曾多次到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红专大学讲授《图书馆工作概论》《图书分类》《图书编目》等课程,特别在编目、分类工作的指导和人员培养方面用力甚巨。这对提高图书馆在职干部的业务素质、促进图书馆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贡献^[7]。

3.4 教书育人的师德观

教书育人是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良好师德的重要体现。他视教学为生命,认为教员首先要教好课,全身心投入教学。不热心教学或不认真教课,不是一个称职的教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期间,刘国钧教课勤勉,准备充足,全面细致,教学效果良好,很受学生尊敬。曾受教于刘国钧先生的吴慰慈教授回忆:“从王重民、刘国钧等教授的教学和科研中领悟到,每研究一个问题,必须广泛搜集和详细占有资料,然后缜密考校,去伪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博于征引而慎下论断。”^[8]

刘国钧在教学工作中十分严谨,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特别重视学生实际图书馆学知识和技能的培养。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的朱天俊回忆刘国钧“在教学领域中孜孜不倦、循循善诱的精神,影响了全系师生……从根本上改变了系的面貌,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5]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金恩辉回忆到:“刘老师将我们找到他家座谈,对每一章节、每一段落、每一数据和引文,甚至每一句话都斟酌、核问和推敲,几经讨论和修改,最后由刘老师加工、定稿……我们这些20岁上下的大学生从刘先生那里学到了撰写科学论文的作风、态度、方法和能力,这是我充满感激之心而永远难以忘怀的事。”^[9]

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刘国钧宽容大度,对学生充满了信任、体谅、理解、期望之情^[35]。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学生们对二三十年代中美图书馆界交往历史持否定态度,对韦棣华、鲍士伟等美国图书馆学界友人来华引导中国图书馆事业这一事件持负面评价时^[6],刘国钧先生既能坚持真理、正视历史,对学生们循循善诱、耐心解释,同时也能体谅和理解学生们的看法。

3.5 知行合一的教学观

图书馆学是一门致用科学。刘国钧认为:“图书馆学有其实践的目的——改变现实使它更合于人们的理想。它企图改造的现实乃是人们的文化生活。”^[36]他一生都聚焦于图书馆实际工作,致力于图书馆学教育的实践性。1928年刘国钧出任金陵大学文理科长,他和李小缘都认为图书馆工作是一种“专门职业”,课程建设要体现“致用之学”的特点。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中国重要书籍研究”“目录学”“分类法”“编目法”“杂志报纸政府公文”“特种图书馆”“民众图书馆”“索引与序列”“书史学”“印刷术”“图书馆问题研究”“图书选择原理”“图书馆史”^[9],都是与图书馆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1951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刘国钧认为当时图书馆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实践问题就是分类编目,因此他先后开设了“图书馆分类”“图书馆目录”“中国书史”“现代西方主要分类法评述”等课程^[37]。刘国钧十分看重学生的毕业实习。据朱天俊回忆,刘国钧先生在他们毕业前,“亲自带领全班20余名同学住宿城里北京大学旧址红楼,在北京图书馆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毕业实习。”^[5]从与馆方商订实习计划到批阅实习日记、实习报告,刘国钧事必躬亲,让学生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实践对于图书馆学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一次教学小组会讨论中,刘国钧重点强调了教学中存在的“书本缺乏注重实际”的问题^[8],并编写了《图书馆目录》《中国书史简编》《现代西方主要分类法评述》等贴合图书馆实际工作内容的教材和专著。此外,刘国钧还坚持每周末到北京图书馆参与顾问工作,指导馆员实际编目。

3.6 富有前瞻性的学科建设观

作为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刘国钧深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基础和支撑。这一理念最明显地体现在刘国钧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期间的学术研究活动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但图书馆学研究风气不浓,理论研究薄弱。“许多人对这门学科的认识还很模糊,时常有人问:什么是图书馆学?这也是一门科学吗?”^[36]很显然,加强学科建设和学科理论研究对当时的专业教育而言是很重要的问题。于是,刘国钧于1957年发表了《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科学理性地回答了对图书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



的怀疑,从理论层面明确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体系构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的文章,当时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图书馆学的大讨论。不幸这篇文章后来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误读。今天图书馆学界对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已经给予了高度评价。笔者认为,从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我国图书馆学教材匮乏和科目陈旧等问题,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期间,不断主持修订或调整教学计划,从课程和教材等多方面着手,积极改革当时陈旧的图书馆学学科内容。他一方面热心研究苏联图书馆学院课程和苏联图书馆学术发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北京大学开设“俄文图书编目法”课程。为填补教材匮乏的窘境,他除了自学钻研俄语,翻译苏联的图书专著之外,还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编写了一批代表当时我国图书馆学顶尖水平的讲义。在开设“中国书史”课程时,他具体研究了中苏文化交流中,中国政治、经济、文艺、教育、工业、交通等书籍在苏联的出版发行和研究情况,并形成翻译手稿《中国书籍在苏联》^[8]。为适应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他研究筹建新课、聘请教师,开设了“科技情报工作”等新科目^[5]。

刘国钧也深知“人”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他十分重视调研图书馆界对图书馆专业人才的要求,经常召开座谈会,收集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意见和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为提升教学水平,他提出“助教研究、留学”“改良待遇”“健全行政”“增加公费”“充实教员”等方案^[8],来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积极性。他利用有限的条件致力于提升图书馆学专业办学层次,积极申请图书馆学研究生培养,并于1964年成功为中国目录学史、图书分类两个专业方向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开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之先河。

刘国钧富有前瞻性的学科建设理念,还体现在“文革”期间,始终关注并及时掌握世界图书馆事业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的发展动向,如前文提到的对机读目录和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应用的关注,希望这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能及时引入中国。

4 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刘国钧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博大精深。虽然刘

国钧先生已作古40年,先生念兹在兹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笔者认为,这种价值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刘国钧主张图书馆学教育包含“社会教育”思想,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49年以后,图书馆教育中的“社会教育”含义逐渐淡化乃至完全消失,图书馆学教育专指培养图书馆员的专业教育。这当然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上世纪50年代的扫除文盲运动和后来义务教育的发展,使图书馆无须再承担基层民众“断文识字”的教育功能。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其实有了更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2017年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了公共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的功能。新时代公共图书馆最重要的社会教育,如阅读推广,已经连续多年被列入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图书馆学教育在这方面可以开展的工作,如根据各种阅读需要编撰“推荐书目”、面向社会开办关于阅读的讲座等等;又如社会信息素养教育,就是将学校的信息素养教育推向社会,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信息素养教育,提高公众的信息意识以及信息获取、鉴别、分析和利用能力。图书馆学教育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第二,刘国钧秉持的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人才要德才兼备的思想,与当今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是一致的。图书馆学教育当然要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相关学科知识。但同样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这种品德首先就包括了刘国钧所抱有的家国情怀,以服务国家为己任,以奉献社会为志业。这种品德也包括了对事业的忠诚,对图书馆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从事图书馆职业有光荣感和使命感。倡导这种职业精神,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一些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曲解了培养宽口径、复合型人才的教育改革方针,不是教育学生热爱图书馆事业,而是刻意引导学生与图书馆“切割”,这显然有违图书馆学教育的初衷,也是与刘国钧等先贤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格格不入的。

第三,刘国钧倡导并践行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仍然是今天图书馆学教育应该坚持的方向。图书馆学是致用之学,图书馆学教育要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刘国钧等老一辈图书馆学家一



以贯之的图书馆学教育理念。今天应该没有人否认这一理念的正确性,但在践行这一理念方面是存在问题的。其表现一是教学内容跟不上图书馆实践的发展,陈旧过时;二是教学内容过于注重理论,没有来自实践的案例作为支撑;三是将实践局限于实习课或实验室,而很少参与到真实的实践活动中去;四是缺乏教师和学生参与图书馆实践活动的机制性安排。因此,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落到实处,仍然是今天图书馆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马宗荣.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研究[J].学艺杂志,1930(7):54-61.
- 2 徐铁猷.“北刘南杜”和“中西两杜”[N].新华书目报,2017-07-14(011).
- 3 丁伟国.基于文献计量的以刘国钧为主题的论文统计分析[J].晋图学刊,2013(6):12-17.
- 4 李明华.薪火相传事业兴旺——弟子们发扬刘国钧先生学说述略[G]//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364.
- 5 朱天俊.一代宗师风范长存——回忆刘国钧先生在北大的日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59-62,70.
- 6 金恩辉.纪念刘国钧教授逝世20周年——回忆50余年前往事[J].图书馆学研究,2011(2):98-101.
- 7 吴慰慈.试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120周年[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6):5-9.
- 8 曹阳,顾晓光.片纸旧墨中的刘国钧[J].图书馆论坛,2020,40(11):125-130.
- 9 徐雁,张思瑶,王萍.植桃李培,薪尽火传——我国现代著名图书馆学教育家刘国钧先生的斐然教绩[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6):10-16.
- 10 刘国钧.学术团体与文化进化.少年世界,1920,1(9):1-2.
- 11 吴稼年.论刘国钧先生早期图书馆学术思想特色与哲学思想来源[J].图书馆,2013(3):24-29.
- 12 吴稼年.罗素对刘国钧的影响[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3,33(1):42-49.
- 13 刘衡如.会员通讯[J].少年中国,1922,3(12):64-66.
- 14 刘衡如.杜威论哲学改造[J].东方杂志,1921,18(8):37-50.
- 15 顾焯青.刘国钧先生在金陵大学及中学的学习情况——基于学籍档案等材料的解读[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6):26-36.
- 16 刘宇初.图林硕望,薪火相承——纪念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6):40-43.
- 17 刘国钧.敬悼洪范五先生[J].图书馆,1963(1):51-52.

- 18 徐雁,谭华军.刘国钧先生任职金陵大学时期的专业建树[J].江苏图书馆学报,2000(6):53-57.
- 19 董隽,唐红安.刘国钧先生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经过及其影响[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6):17.
- 20 唐红安,宋戈.刘国钧创办《西北文化周刊》的经过及其价值[J].图书馆学刊,2015(7):114-118.
- 21 董隽.刘国钧任职国立西北图书馆时的业绩[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128-130.
- 22 谢欢.“图书馆教育”一词含义的历史演进[J].图书情报知识,2016(6):32-41.
- 23 杜定友.图书馆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7-8.
- 24 刘国钧.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J].新教育,1923,7(1):2.
- 25 图书馆界[N].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12-31.
- 26 刘国钧.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G]//史永元,张树华.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1-3.
- 27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M].上海:中华书局,1934:7.
- 28 吴稼年,顾焯青.论刘国钧先生早期的图书馆学思想[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37(5):93-100.
- 29 赵长林.传奇是这样铸就的——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刘国钧[J].图书馆,2010(2):39-40,45.
- 30 刘亮,杨玉麟.抗战时期图书馆学人的救亡思想——以沈祖荣、杜定友、李小缘、刘国钧为例[J].图书馆,2011(5):136-139.
- 31 易雪梅.刘国钧先生与国立西北图书馆——兼论刘国钧的办馆思想[J].图书与情报,1986(4):9-13,25.
- 32 刘国钧.图书馆员应有之素养[J].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9):33-36.
- 33 刘国钧.也谈谈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G]//史永元,张树华.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270-274.
- 34 白国应.刘国钧先生的优秀品质[J].图书与情报,2000(1):65-68.
- 35 金恩晖.书林五味[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32.
- 36 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J].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1-5.
- 37 程焕文.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谨以此文纪念李大钊130周年诞辰刘国钧120周年诞辰[J].图书馆杂志,2019,38(12):11-15.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收稿日期:2020年8月29日

修回日期:2020年9月23日

(责任编辑:支娟)

(转第106页)